

THE BEWILDERNESS AT SUNSET



JYE FANGJUN CHUBANSHE

落日困惑

THE PLA PUBLISHINGHOUSE 张廷竹

解放军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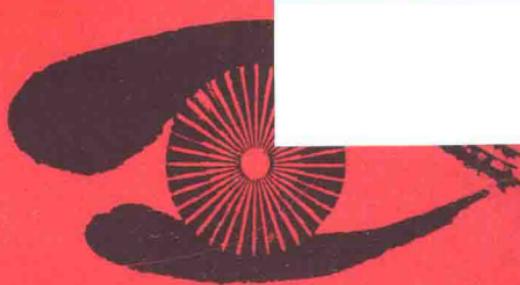


THE BEWILDERNESS AT SUNSET

THE PLA PUBLISHINGHOUSE

落 惑

张廷竹



解放军出版社

落 日 困 惑
张 廷 竹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国防大学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6开本 8.625印张 184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065-0949-0/I·122

定价：3.80元

社编号：04—0022

在民族化的追求中确立个性是我对军事文学的一种追求。当然，对民族历史的开拓使我的战争小说在寓意上具有了超越表层具象意义的品格。我更追求它的人性和世界性。

——张廷竹



“战史文学”的一次有益尝试

——长篇小说《落日困惑》评论暨代序

高松年

读完张廷竹长篇新著《落日困惑》，联想起不久前其与另二位同志合写的关于“战史文学”的论文，上面的这一命题就很自然地浮上了我的脑海。不错，这部长篇就是廷竹在最近以来，对于“战史文学”思考和呼唤的又一次自觉地自我实践。

何谓“战史文学”？廷竹在他们的论文一开头就作了详尽但有点冗繁的界定：

“它是建立在战争历史载体上的文学作品。它是经过诗化了的战争史，充满文学的主动精神，在历史观点、审美意识、哲学思辨的基础上，注入创作本体全方位的思考（包括引起战争和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政治、经济、军事、自然、地理、民族心理、国家利益等等，种种必然的和偶然的因素所构成的社会矛盾和文化嬗变），使它产生人通过战争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审美判断的集中表现，也就是艺术的表现，从而为全人类（而不仅仅是为哪一个社会形态）揭示出进化的隐秘诫语，描摹出一

一条若隐若现，波澜起伏，从发生到消亡的昂扬而又悲壮的曲线。使人们在得到艺术享受的同时，感受到人类历史的发展、延伸与超越。”

他还说：“这是一条苛刻的难以描摹的曲线。”不过，我的理解要简单一些。我以为，他们所说的“战史文学”，简言之不外乎就是战争历史的文学表现，或言透过文学观照反映战争历史。它是军事文学中描述战争历史的部分；又是历史小说中涉及战争现象的部分。这类文学作品古已有之，从古至今我们可开列出一大串名单来。《三国》、《水浒》、《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东方》、《南京的陷落》、《皖南事变》、《红高粱》、《灵旗》，以及张廷竹先《落日困惑》而写出的《黑太阳》、《酋长营》等等，均可作此类归属。那么，张廷竹何以要在现在又迫切地呼唤起它来呢？这是因为他看来，“战史文学”是军事文学的“制高点”。虽然在建国以来，尤其是进入新时期后，我国的军事文学是在不断地前进，然而从创作的整体文学格局看，真正属高质量之作尚为数寥寥，而且，即便在一些为人们所称道的作品之中，也由于时代和思想的种种限制，都存在着一些令人遗憾的不足之处。因而，眼下当我们的军事文学创作面临新突破的苦恼之际，对于其“制高点”——“战史文学”的呼唤就成为必要。

“战史文学”既与“史”有关，作品的历史感

和真实感的命题就十分严肃地摆在每一个涉足此领域的作家的面前。自然，不同的作家可以通过自己熟悉的不同途径去实现，但回避与改造则都不可取。以往有些作品，出于单一的宣传功利目的，对于历史不无“净化”处理，常常只去体现来之于思想共性要求的一面，而不努力去开掘实际历史生活中丰富多采的个性表现，于是，文学成了单一色的宣传材料，虽也有宣传方面的积极作用，却失去了文学角度更多的审美价值。后来，在冲破了这种线性思想框架之后，一些作者却又一头扎进了另一种有违文学规律的形式框架，他们对战争并不深入了解，却又随心所欲去写战争，他们笔下的“战争”是作者自己“制造”出来的，所写的与实际发生的战争却毫不相干，这一样使作品出现矫情与虚假，容易失去作为涉史文学作品的特定的审美价值。有感于上述的种种遗憾和弊端，因而，张廷竹在《落日困惑》等有关作品的创作中就努力去闯出一条既适合于自己又符合文学规律的战史小说的新路。在这一路径上，须在详尽占有史料的情况下，尽可能以现代意识高屋建瓴地去把握战史生活的总体面貌和内在神髓，让战争生活历史真实地并在许多复杂方面得到充分地观照与显现，从而，完整地而不是单线平面或随心所欲地反映出战史的真实风貌。

《落日困惑》描写的是中国现代战争史中一段鲜为人知也较难反映的特殊的军事斗争历史。一方面这件事发生在当时属国民党部队所辖的战区，事件

的主要当事者是一位国民党部队的陆军中将，另方面当这位张将军奉命去滇越边境接受日军投降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是日、法、越共、中共以及国民党上层几方势力错综复杂交相插手的难堪局面。面对这样特殊的历史素材，作品怎样准确地把握？能不能和敢不敢如实地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映？这是摆在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作为我们的军事文学的创作，其主调自然还是应当要强调表现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民族的自尊、自强、自力等等。虽然，时至今日，那种只图解某种政治意图的做法，仅用阶级斗争的目光去审视战争的做法，显已不再成为约束我们作家创作的狭隘框式，可是，面对具体的上述复杂素材，如何正确地去体现其中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民族情感等一系列核心命题呢？张廷竹认为，它应当是以“能凝聚民族魂魄，弘扬人类品格，一切向着未来，展示着人类坚韧进化的趋势”为前提。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可有它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它是支撑每个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民族的骨骼。一部战争史决不是拴在单一因果链上滚动的齿轮，真实的历史需要真诚无偏见的发现。当然，作家在表达时也不可能完全是纯客观的摹拟，它总是要把创作主体特定的审美观照意识渗透其中的。因此，我们所褒扬的只要是符合人类精神，向着未来，符合人类进化趋势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民族秉性，那么，曾在中越边境所发生过的这一段特殊的军事斗争史也就没有什么不好把握。

的了。就是循着这样的路径走进去，张廷竹在小说中没有人为地将人物、事件作理想化处理，也没有从结果去直接推导原因，更没有去改写历史，他尽可能严谨地将历史事件置于当时宏阔真实的国际国内背景之中，写出了当事各方人等在复杂背景之中的真实处境与性格心理，从而展现出了历史本身固有的斑斓色相。

应当说，在小说中张廷竹对于当时特定社会环境情势的把握是准确的，作品对当时历史背景所作的概括是真实可信的。但值得我们赞赏的尚不仅仅是他直面错综复杂令人眩目的环境情势，不惮作如实客观描述的胆识；而更在于他能将笔触透过史实表层，托现出一股正气，一种精神，让正义战胜邪恶的伟力始终在作品中回流，让人浸润在虽令人晕眩困惑无可奈何却又是壮怀激烈让人震动不已的艺术氛围之中。唯其如此，这部作品不仅给读者提供了全面地立体化地理解历史的契机，而且也能使人充分地感应到民族魂魄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主旋律。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在本战区接受日方投降本是顺理成章之事，可在中越边境由张将军奉命去执行受降之事却没有那么简单顺利。一方面国民党上层相互倾轧各怀私心，在这件事上做了不少手脚，妨碍了受降工作的顺利进行；另方面当年曾向日军妥协而从越南逃入我云南境内的法国军队此时又偷偷地想去摘桃，企图借此再度恢复他们在越南的殖民统治；而日本

军队则出于某种萎缩心理也向法军暗送秋波，妄图在投降这件事上稍稍挽回一点面子；至于越南人民解放力量和我国人民解放力量出于对世界人民的胜利成果的捍卫，也在这件事上施加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因此，作为一个正直的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和复仇意识的中国将军，在如此纷复的背景下，他能够做的也只能是尽其所能，故而张将军是在极其艰难的境况下正气凛然又不无悲苦地奏响了民族军魂高亢的主旋律。实际上，张将军所经历到的困惑迷茫和无可奈何的局面，也正是当时中国的一个时代特征。作者越是写透彻张将军在当时情势下自感无力回天而苦恼，便越是真实深刻地揭示出民族之魂在这样的环境下挣扎、苦斗的光彩和力量。

显见，战史小说并不是非文学的回忆录，不仅仅是历史。因而，真实在此作为一个必要手段并不是战史文学的根本目的所在。作为文学作品，它应该是诗。文学要写人，要透过人而注入思想和情感。前面说过，《落日困惑》正是由于在真实地展现历史的同时渗透进了文学的观照意识，所以，作品才读来耐人寻味，有可参与创造的余地。

值得指出的是，小说在人物塑造上是有特色有成绩的。由于作者能以开阔的历史眼光从整体上去把握历史的真实性，在人物塑造上能注意到复原和展现战争活动中各类人物本来的真实面目。不因尊者友者而讳言其疾，不因恶者敌者而增添其丑，也不为单一的某种需要而去改变历史人物的是非愚贤

言行得失。同时，能按照生活的逻辑，具体地写出各色人等的七情六欲、个性心理。小说中的人物不是作为一个个抽象的符号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的历史人物而出现。无论法军上校、日军大佐还是越南革命党人、中共地下党员；无论是情人、友朋还是马弁、侍从，一个个都是作为实在的有生命力的人而生活在作品中，作者向我们展示的不是平面的单一的人和事，而是有血肉有情感的人生。因此，小说所写的几个主要人物，均是个性分明，轮廓清晰，呼之欲出，有一定的生命活力的。

在这部小说中刻划得最为成功的，显然要推张将军这一个形象。廷竹的生身父亲就曾是这样的一位爱国将领。看得出来张廷竹在创作中是充满着一种儿子对于父亲的炽热真挚的怀念和尊仰之情的。虽然，他在懂事之后始终没有见过他父亲其人，但根据对于史实的追索，他想象他的父亲应是一个在特定时代充满着民族复仇意识的巴顿式的中国军人。因而，他无疑是把他父亲作为一个英雄人物，作为“中国军人的精魂”来描写的。但我们看到他无意把这个人物写得十全十美，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只活在纸上的英雄。张将军嫉恶如仇，敌友分明，敢恨敢爱，敢作敢为，他正气凛然，赤心爱国，心智胆大，勇往直前。但是，这位将军有时行事不免粗鲁性急，大意疏忽，以致小则误解自己的朋友，大则枉然牺牲了下属战友。他虽能辨善识恶，壁垒

分明，可对待下属方面似乎严肃有过，体恤不足。在处理具体事情上，张将军可以一身刚气，义无反顾，可一当环顾分析大局之时，他则又变得恍惚迷离、消沉颓唐，悲观自虐而又不敢违命抗争。在他的身上既可看到为了捍卫民族与国家尊严而表现出来的刚劲强硬的一面；又可看到长期接受传统儒学思想的薰陶而产生的软弱和妥协的一面。刚毅与软弱，斗争与妥协，自信与消沉，壮烈与悲观等均非常矛盾又非常和谐地集于他一身。张廷竹努力发掘出张将军性格内涵中属悲剧性的一面，却并不去加以丑化，其目的是要透过人物而去觅求作者自己对于历史的某种悟性，要把自己对于历史社会和人生等方面的哲理思考，融合到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中去。所以，他始终将人物置于时代的大波大浪之中，除了从民族气质、文化素养等方面去展现人物性格的外在表现外，还进一步写出时代环境对于人物性格所产生的各种影响。这样，一个作为“中国军魂”形象的张将军的阶级意识、政治态度、性格特征等就得到了较为鲜明凸现，同时，也对构成上述特征精神内核的文化与时代的渊源也有了较好深入地揭示。一个本民族特定时代的以复仇意识为其主导意识的爱国将领的悲剧性形象就在作品中屹立了起来。在“这一个”形象上，打着鲜明的民族烙印、文化烙印和时代烙印，也打着只属于他自己的个性烙印。

张廷竹不为尊者讳，在一定的文学审美意识观

照下，还从人性、人情的角度把父亲这一形象的优点与缺点，强点与弱点，得意与失望，欢乐与痛苦，顺利与艰难，甚至内心深处的某些欲望冲动、隐私苦衷都恰到好处地端到纸面上来，从而使形象真实可信，有血有肉，有历史深度，且能给人以多面立体的感觉。诚然，倘能从文化心理的视角再深加开发，精雕细刻，那么，人物的审美意识定将更为丰富，作品也必将更加凝重、耐读。

《落日困惑》在叙事格局上也有自己的特色。小说以叙事人“我”亲自进入角色，且在叙述父亲的历史故事中偶而也直接插入“我”的一些今日故事，两个时代发生在同一地方的不同性质的故事，可引起人们深广的历史联想和阅读兴趣，这对于开发与深化作品内涵无疑是大有好处的。

这一个在作品中叙述着故事的“我”，我们不妨就可以视为是张廷竹本人。因为，我们发现，他所谈到的一些今日的故事，也确是他在实际生活中所发生过、经历过的。因而由“我”来讲述“父亲的故事”，使人产生一种亲切感、真实感，以及历史的贯通和历史的距离之感。而作者的这种着意于强化真实感和历史感的作法，对于“战史文学”的创作来说，无疑是大为有益的。

由“我”来叙述“父亲的故事”，也便于作者在历史故事的叙述过程中直接渗入当代人的审美观念和观照意识。对于读者来说则似乎又增多了一把深入去理解作品的钥匙。这实在是一种颇为聪明的

叙事方式。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这样的叙事格局，张廷竹在先此写出的《黑太阳》、《酋长营》、《支那河》中也使用过了。也许是得心应手，所以他也就一用再用，舍不得变更。据我所知，他在新近写出的其他一些小说（如《走向天国》）中，也都是使用了这种类似的叙事格式的。我并不反对这种叙事格式，但我以为文学作品的叙事格式应当是多种多样的，不要只搞一个模式。再好的东西，多了必然会生厌，到了生厌再去谋求改变就其味不佳了。

廷竹最近已将《落日困惑》交付出版，特嘱我为此书写几句话。还好我有此短文草就权作代序吧。

1988年1月30日于杭州北斋

天上熔化着一轮白日，晒焦的绿草上腾起了燥热的紫色，苦重而炎热的空气仿佛凝滞了，万物皆已死净。我父亲感觉到衬衫的硬领卡得脖颈阵阵作痛，他抬起头来将领带扯松了一点。远处的直升机已开始发动了，螺旋桨在机顶上扬起了迷茫的灰雾。他茫然地看着副官唐小三儿拎着他的皮箱向舷梯走去。他觉得如置身于梦景一般的奇特的眩晕。他想起了八年前的一个中午，白炽的银液般的毒日光也是这样狠狠地刺着他们。现在他依然可以闻到那一股隐隐的铁锈的味道，那是笨重的装甲车压过沥青路时散发出的臭气。他记得臭气越来越浓，融入了猩红的欲望猩红的血浆。疯子般的大火在徐州市区至宿县的公路上麦地里汹涌燃烧，火苗上卷着的黑烟染尽苍穹。这是一片不可遏止的永不熄灭的烈火。当时，他好象是这样的想过来着：列火中有一股埋藏着的不可摧毁的力量。他记得队伍溃散得不成样子了。一个六十军的中校团副就在他的身边被炸成了两截。“弟兄们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解放，发扬我、我们、护国、靖国、的、荣、荣、光……”，

中校是条好汉，临死前还哼出了这两句歌词。六十军的军歌。他记得他把他的半截躯体抱在了怀里，热泪盈眶。后来他在九里山下的一个村庄里找到了未及撤走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他看到孙连仲和他的随行人员已经换上了便衣准备夺路而逃。他咬碎了牙根。五十万人啊，参加徐州会战的五十万中国军人，一下子就成了弃儿！他恶狠狠地说道。凛凛一躯，独立于沙漠般寥廓的疆场；头颅低垂，双手捧着烧焦的军旗的一角；他把他的卫队集合起来了。他记得他悲愤交加地凝视着这几个来自洞庭湖畔的家乡子弟，看着他们满是血污的躯体和撕破挂落的衣衫，心头腾地升起一股杀气。“我们是中国军人的精魂，”他说，举起手里的一挺玛克沁机枪，“宁死不做亡国奴，拼命啦！看他娘的最后投降的到底是谁？！”——于是，他们咬牙切齿新仇旧恨，在一片梦一般的鲜红、蔚蓝、铅黑和战栗的火苗中光彩夺目地燃烧了。他们的断裂的肢体象璀璨的纸鹞一样飞上了天空并且将阳光分裂成无数的碎片了。他们终于冲出了重围。一共是四十个人。四十个人啊，现在老头子站在飞机前这样想道。后来剩下了八个人。但是——，但是我们终于取得了自己的生命的主权，国家的主权。

他走上了舷梯，走进机舱。

这就是一九四五年夏日的一个中午，我父亲这个刚从缅甸战场上下来的国民党游击司令，在重庆珊瑚坝军用机场登上重返亚细亚丛林的直升机

时，脑子里迅速掠过的一缕游思。他接受了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的指令，前往滇东南与两年前逃入我国云南境内的法国驻越南殖民军司令亚历山德利进行谈判，希望他们服从中国政府的命令，放下武器，准备离开中国境内。他不明白这样的差使为什么要落到他的头上，而不是让云南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卢汉、省主席龙云——这两个土生土长的地头蛇彝族娃子出面解决？何应钦笑了。他拉开了总司令官邸的窗帷。面前是一个被晚霞染得庄重的世界。烧熔的金属浪涛般的蠕动延伸出新的天地。歌乐山的陡峭山壁上原先那种不可思议的神情，那种九死不悔，气吞万里的悲壮已经消失了，在一片错落有致的别墅洋房的上空，氤氲着一片温柔的玫瑰色的云彩。

“您忘记了八年抗战中龙云的表现吗？”何应钦说。他的一双小眼睛眯成了两条深刻的细缝。父亲打了一个寒噤。他知道龙云拥兵自重，把云南搞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王朝；龙云曾经对汪精卫推崇备至，助汪逃跑投敌；而在远征军与美国军队入征缅甸时，大军云集云南，供应繁重，龙云解决不力，不执行中央的政令；……——是的，委座蒋公是不会容忍他的这种行为的。但是，抗战的胜利刚刚到来，残敌远未全部投降呢，在这样的时刻就对一位封疆大吏动起了手脚，岂不叫人心寒？

八年了。父亲回首往事时怆然涕下。他一上了飞机，就将脸转向了舷窗口。舷窗外面涌动的云层似乎在闪开着。远处的银灰色的云层在激烈地翻滚。